

上海博物馆编

文明对比手册



从希腊到罗马的古典构建

从埃及到中国的海上交通

从沃伦杯到霸王别姬

从亡灵书到丁形帛画

从iPhone到景德镇瓷器

从尘世乐园到清明上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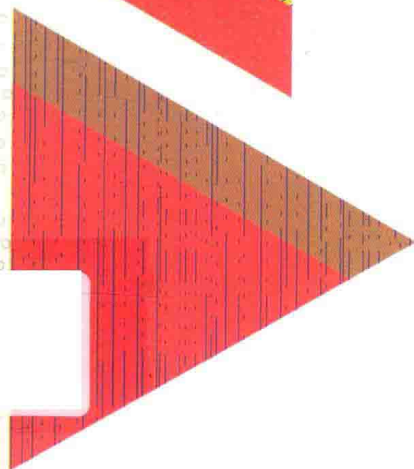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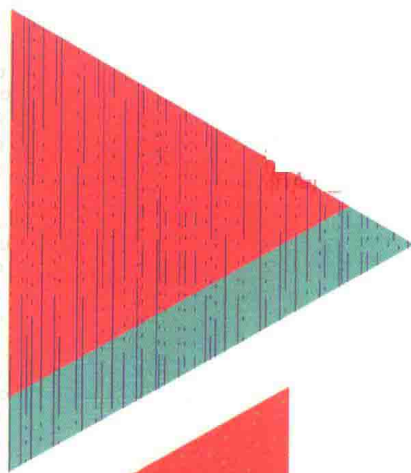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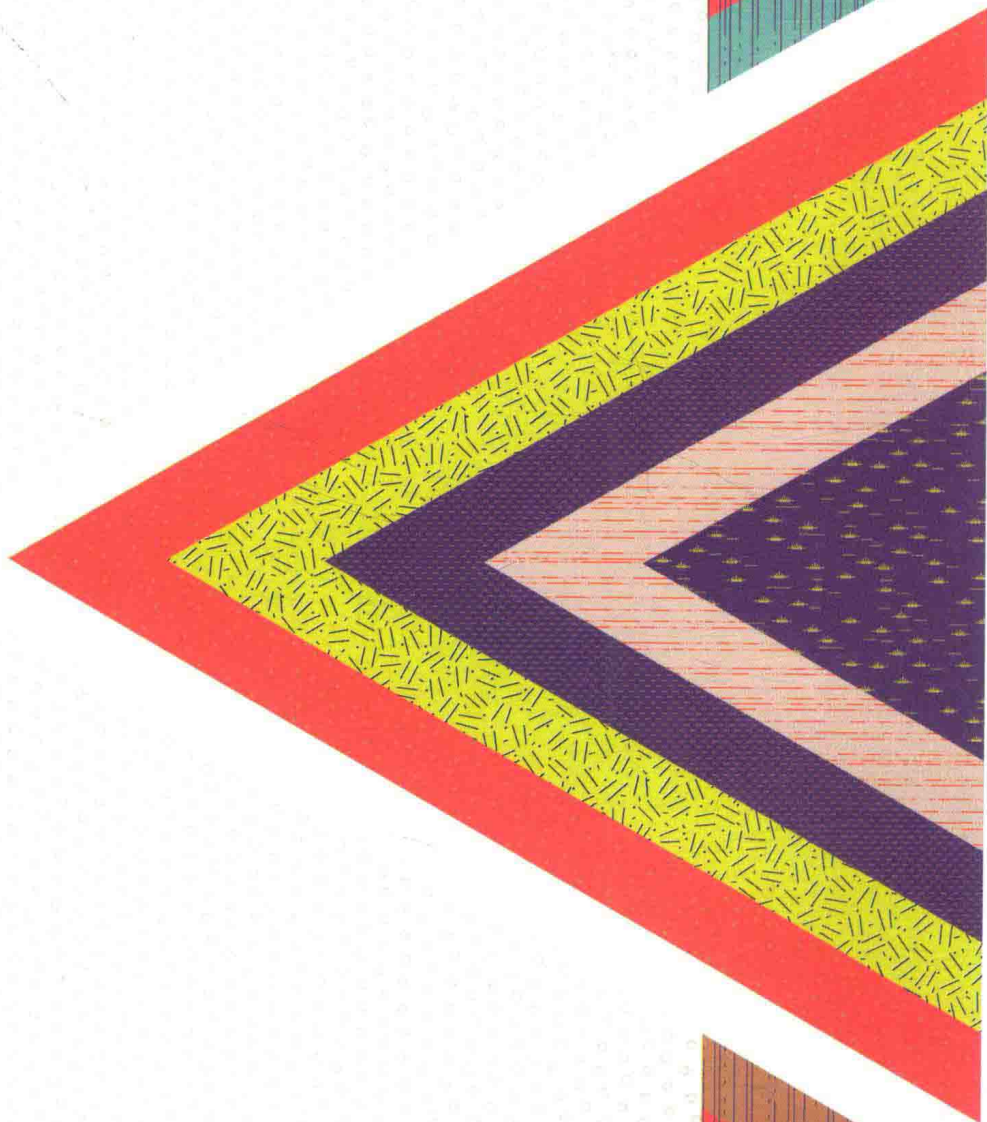
……

无不渗透着中西文明间的
碰撞与碰撞

START
USE

上海博物館 编

文明对比手册



START
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对比手册 / 上海博物馆编.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25-8481-9

I. ①文… II. ①上… III. ①文物—考古—对比研究—中国、英国 IV. ①K870.4 ②K88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4098 号

著作责任者: 上海博物馆 编

主 编: 杨志刚

策 划: 陈曾路

特 约 编 辑: 杨烨旻 顾婧

装 帧 设 计: 曹文涛

文明对比手册

上海博物馆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2.5 字数 250,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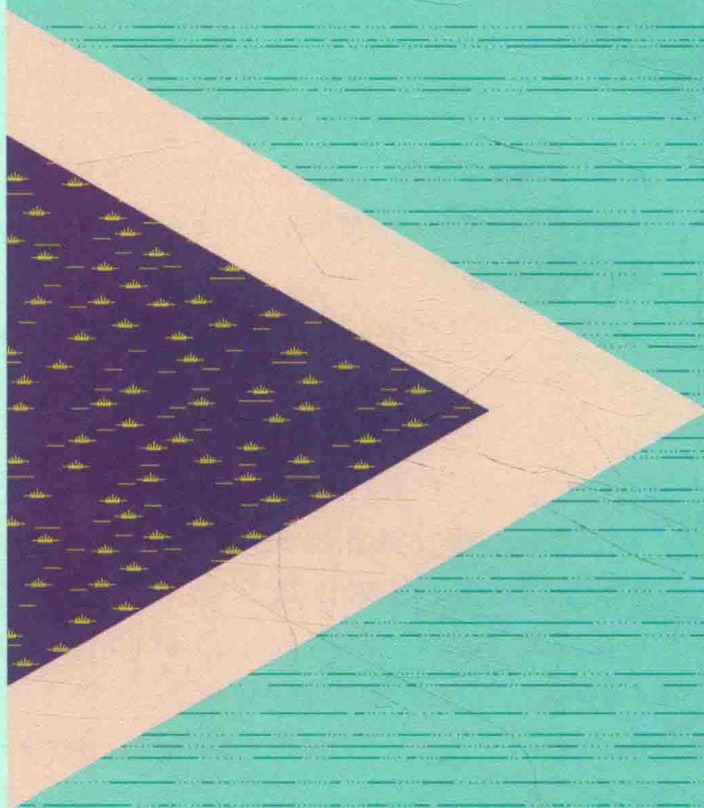
印数: 1-4,300

ISBN 978-7-5325-8481-9

K · 2334 定价: 7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文明的星河



目录

文明的星河

- 001 上下埃及行旅记——早期埃及统一国家的文化动力 / 颜海英
015 古代埃及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 / 林梅村
028 从希腊到罗马——古典和传统的构建 / 陈恒
053 神圣与世俗——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星空下 / 朱孝远

文明的异色

- 067 瑞兽主宰的文明兴衰——二里头龙形器与阿兹特克双头蛇 / 杜甦
077 景德镇瓷器与 iPhone / 陆天又
085 蓝与白 / 吕维敏
094 人间异色——沃伦杯和《霸王别姬》中的情与欲 / 鲍文炜

文明的记忆

- 103 “T形帛画”与“亡灵书” / 陆天又
111 风景的观看记忆——《溪山行旅图》与《尤利西斯的凝视》 / 杜甦
119 失序的隐喻与象征——《清明上河图》和《尘世乐园》 / 顾婧
131 《寒食帖》与伊斯兰书法 / 陆天又
139 书踪画影——《凯尔经》与雕版《西厢记》 / 徐绯璇

文明的膏腴

- 149 王的雕塑——权力驱使下的古埃及、古罗马与古中国雕塑比较 / 鲍文炜
158 书写的力量——史墙盘与罗塞塔石碑 / 韩少华
166 圣徒的献祭——圣艾格尼斯杯与敦煌壁画中的鹿王本生故事 / 韩少华
174 壁画·空间·人神之界 / 吕维敏

187 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 / 陈曾路

上下埃及行旅记

——早期埃及统一国家的文化动力

颜海英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古埃及早期国家的起源、早期王权的形成等问题，长期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证据，但这些反映史前遗址情况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包括神话传说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解读。本文试图对三种基本资料——考古、史料、神话进行不同的处理，建构起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理解古埃及人宇宙观的前提下，对古埃及早期国家的起源有更深入的认识。

关于埃及国家起源的理论探讨及其陷阱

酋邦理论与埃及国家起源

以塞尔维斯和弗里德为代表的酋邦说在国家探源的讨论中有深远的影响。该理论试图将国家与政府的出现与文明的起源结合起来。1962年，塞尔维斯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四阶段社会进化模式。认为“酋邦”是部分平等主义的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过渡形态。1975年，塞尔维斯进一步对酋邦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个非武力的，由神权向政府和法制统治机制过渡的贵族社会，而探讨这一阶段政府和法制的形成是探索国家起源原因的关键”。^[1]

埃及国家的形成是塞尔维斯运用酋邦理论的重要例子。他认为在国家形成时期，埃及的地方组织——诺姆并非以城市为中心，而是有神庙和神祇的宗教中心。“在某些方面，刚刚完成统一的埃及实际上就像是在苏美尔神庙酋邦之上附加上分散的小州。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政府，法老的神庙只不过是一个精致的酋邦，因为地方的特殊原因，能够控制一

个对于酋邦来说规模巨大的疆域”。^[2]

他甚至认为古王国时期的埃及还是一个神权国家，“直到第4王朝之前，神权政治没有明确的权力划分，那时宰相兼有某种大法官和首相的职能”。^[3]

显然，他把诺姆解释成宗教中心是非常错误的。从考古和文献证据看，在中王国之前，埃及的地方神庙不论是规模，还是经济实力都很小，根本不是当时社会的“中心”。

塞尔维斯认为古埃及人的来世观念决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大规模墓葬建筑，导致庞大的管理机构和工匠“行会”的出现。但奇怪的是，他却认为这个时期的埃及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阶级。实际上，早在前王朝时期，萨卡拉、阿拜多斯和其他地方的大墓已经表明社会等级和私人财富的存在。

尽管他对古埃及社会的解释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但却准确地指出了埃及在国家形成时期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没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常备军；二是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的早期城市相比，埃及的地方城市缺少自治性和独立性。

总而言之，与考古学的理论模式相比，以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埃及国家起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作为埃及学专业之外的学者，他们在创建这些理论时所依据的资料有很大的问题，一是不能准确、全面地掌握考古资料，二是他们所使用的文献多是早年作为通俗读物出版的、有许多错误的二手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理论再回到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来，因为加上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式做包装，使得埃及学家对它们不加怀疑地使用，得出更进一步的错误结论，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一般性理论”与埃及国家起源

瓦尔伯顿（D.Warburton）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即“一般性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定义应该能够包括所有的国家，不管是“早期的”还是“工业化时期的”。^[4]

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国家”视为一个演变中的概念，君权和其他权力的分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同。他认为，国家的定义必须涵盖所有的国家，而不是把某些视为“酋邦”，某些视为“工业化的国家”，因为所谓“不合格”的国家也具备“合格”国家的某些特征。因此，他对国家下的定义是：位于特定地理位置、居民有自己的社会结构的政治实体。^[5]

瓦尔伯顿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定义都必须能够解释每一种特别的国家。该理论认为，所有的政治实体或者制度都是战争、习俗和技术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个因素在国家演进的过程中所占的比例决定了早期国家的各种类型。不管文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地理位置是怎样的，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一直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是理解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不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可以在这个理论模式中找到

到解释。^[6]

在这三个要素中，军事征服发生在国家出现之前，因此，国家的出现是受控于军事环境的，而不是相反。习俗是在征服之前本地的法律、宗教、传统、社会等级和其他人类生活的共同特征，它们决定了军事征服后的社会文化水平。技术发展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受习俗的影响，但是技术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特征。

这个理论使得对于国家演进的分析可以更为普遍，这样不需要把国家分为预先构想的范畴，如早期的、现代的、工业化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古代世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向演进，现代世界的国家也非常不同，尽管都被称作现代国家。因此，每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因素都能在这个理论模式的图表上表现出来，这样每个国家的类型都可以以具体的形式显示出来，而不是用“一刀切”的方式来套。该模式分析的结果是：不同类型的国家可以在世界各地同时存在，而相似的国家也可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存在。

这个理论对推动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它特别强调战争、习俗和技术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强调不同因素结合的多样性决定了国家的本质。其中技术对于国家的运转和社会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该理论对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大胆质疑。人们常常认为军队是在国家出现之后产生的，或者说军队是国家为维护其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创建的，瓦尔伯顿却认为，军队早于国家。此外，他认为财富只有在早期国家形成之后才真正开始集中，之前已经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可能对国家发展的方向有所影响，但更可能的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根据这个观点可以引申出两个结论：一、最主要的矛盾是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而不是在两个政治实体之间发生的矛盾；二、贫富分化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对基本资源获取的不平等情况下，不平等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被预言为一种冲突，表现为社会内部某种程度上的持续的敌意和对抗”。^[7]

“一般性理论”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考虑到国家有特定的地理疆域，有同种族的居民，也没有认识到社会内部的对抗常常不如国家和种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激烈。此外，虽然掌握财富的社会上层可以使用暴力表达优越感，通过强制手段得到更多的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常常需要动用暴力，特别是在统治者的权威得到公众普遍认可的情况下。在古埃及历史上，从来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起义。

“一般性理论”认为，把国家起源视为财富分配不平等或者是阶级斗争的结果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两个现象早在国家形成的百万年之前就出现了。

国家起源于战争或贸易的理论也受到了同样的批驳，因为它们也是以经济学的逻辑为基础，认为土地和资源的短缺是扩张或融合最重要的动机。征服可能是一个催化剂，但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在国家出现之前和之后皆如此。

这些关于早期国家起源的理论有着共同的特点，即以经济基础为考察的出发点，围绕人口压力、农业发展、城市化、贸易网络等核心问题，强调内部或者外部的冲突与矛盾，而忽略了思想史层面考察的关键作用。早期社会中宗教信仰对社会分层产生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现代学者的估计。社会精英以整体性的宇宙论为基础创造出高度综合的意识形态，以文字、艺术、建筑等多种形式传递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重新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工具，财富的集中是实践宗教信仰的系列纪念性活动的结果，技术和商业的发展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上下埃及与国家起源

古埃及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两片土地”，尼罗河全长 6648 多公里，在埃及境内有 1200 多公里，流域面积 334.9 平方公里，河宽平均 800 ~ 1000 米，河深 10 ~ 12 米。流经开罗附近时分为五条支流，^[8]呈放射状流入地中海。古埃及人称这个扇形的三角洲为“下埃及”，它直线长有 200 公里，最宽处达 250 公里，今日三角洲占埃及可耕地的 2/3。开罗以南的河谷地带直线长为 700 公里，地形狭窄，宽度从 10 公里到 20 公里不等，古埃及人称之为“上埃及”。

上下埃及的概念根深蒂固，成为古埃及地理特征的典型象征，甚至希伯来语中的埃及一词也是个双数的形式。探讨古埃及国家的起源，必然要追问上下埃及二元组合的起源和意义。

早期的学者们认为埃及曾经有南北两个王国，后来南方征服了北方，完成了统一，因此国王被称为上下埃及之王，而王权的象征也有了如此突出的南边二元对称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上下埃及的二元组合是南北两种不同文化对立的反映：北方与亚洲有交流，是典型的农业生活形态；南方受努比亚地区的非洲文化影响，以游牧生活为主。这两种观点都被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否定了。在埃及的政治统一之前，同质文化已经形成，而这个文化的中心是南方的涅伽达（Naqada）。

在埃及从酋邦到国家的演变过程中，北方相对是滞后的，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南方。

前王朝时期（公元前 3750 ~ 前 3325 年），在上下埃及分别出现了两个区域性文化群，二者之间没有延续性。分布在下埃及（北部）的遗址主要有梅里姆达（Merimda，在三角洲西部）、法雍 A（在法雍地区）、马阿迪（Maadi，在开罗南部）、布托（Buto，在三角洲西北部）。其特点是各文化之间没有连续性，较分散。其中马阿迪遗址中有冶铜遗迹的发现；法雍地区的居民还在食物采集阶段；布托是与西亚交流的重要基地，也是延续到最晚的一个遗址。

上埃及的文化群中，各遗址既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又呈现出区域扩展的特点，更多地为我们提供早期文明起源的信息。^[9]最早出现的是塔萨（Tasian）和巴达里（Badarian）

文化，它们的分布局限于阿什特以南，主要发现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墓地；涅伽达 I 期（也叫阿姆拉特，公元前 3750 ~ 前 3350 年）的典型遗址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从现有发现中还看不出其居民已有贫富分化，但同属这个考古分期的发现分布范围很广，并且与涅伽达 II 期有承继关系。

涅伽达 II 期（公元前 3550 ~ 前 3325 年）是前王朝时期的重要转折点。首先，这是最早与其他地区发生联系的文化，也是分布区域最广的一个，从三角洲地区到盖博尔·艾尔·西西拉（Gebel-el-sisila）以北的河谷地带都有同期遗址发现，其中一些人口集中的遗址如赫拉康波里斯（Hieraconpolis）、科普多斯（Coptos）、涅伽达和阿拜多斯（Abydos）等已呈现出社会分化的迹象。这个时期的艺术主题和工具都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艺术作品出现的“牛顶城墙”、“双狮图”、“长颈怪兽图”，以及建筑中的凹纹城墙，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圆柱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西亚风格。西亚楔形文字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刺激了古埃及文字的发明。此外，两个地区的农作物和驯养动物也非常相似。那么，当时的文化传播是如何发生的呢？学者们猜测其促动力是西亚的和平移民或者暴力入侵，但至今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考虑到进入王朝时期后这种交流的突然中断，也许应提出另一种假设，即在这两个地区的中间地段，当时也许活跃着某个游牧民族，它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并起着传播的媒介作用。游牧民族的居无定所，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现有交流的中介因素的遗迹。其次，涅伽达 II 期也是埃及与努比亚早期文化同步发展、具备相似特征的最后阶段，是二者分流的最早阶段。随着埃及国家的形成、疆域的确定，与努比亚地区在文化上的差别逐渐形成。

在前王朝后期（即涅伽达 III 期，公元前 3325 ~ 前 3085 年），王权出现，区域性文化逐渐趋向统一。这个时期王权的主要标志是王名和王陵的出现。在上埃及、孟菲斯（Memphis）附近和三角洲发现了大量带有王名的纪念物，主要有调色板和权标头两种类型。最著名的是发现于赫拉康波里斯的那尔迈（Narmer）调色板和蝎王权标头，前者表现的是国王那尔迈征服上下埃及、俘获大量战俘的场面；后者表现的是蝎王的远征和主持开渠仪式（或者是神庙奠基仪式）。在这类纪念物上，王名写在象征王宫围墙的王名圈里，国王的庇护神荷鲁斯立在上面；国王通常戴象征上下埃及的两种王冠（白冠象征上埃及，红冠象征下埃及）。

王陵规模的逐渐增大、同期考古遗址分布范围的扩大，反映出前王朝后期文化由区域性向统一性的发展。王陵早在涅伽达 I 期时即已出现，到 II 期时在赫拉康波里斯、涅伽达和阿巴第亚出现的较大规模的王陵反映出区域性统一的特征；而涅伽达 III 期时分布在阿拜多斯、涅伽达和赫拉康波里斯的王陵，规模和形制已与早王朝的王陵基本一致。从考古遗址分布上看，涅伽达 II 期时，涅伽达文化传播到三角洲地区南部；到涅伽达 III 期时，在整个三角洲地区和河谷地区都有涅伽达文化出现。

与南部尼罗河谷相比，三角洲地区的农业条件和贸易环境都有绝对的优势，对比三角

洲的遗址 Merillda 和 Maadi 与南部埃及的赫拉康波里斯和巴达里，前者居住集中，面积大、地层深，居住时间长，而后者较分散，地层浅，因此结构保存较差。也就是说，南部埃及的聚落从人口密度和农业潜力上都比三角洲地区差，尽管这些遗址很贫瘠，没有发展农业的潜力，但它们却发展成南部埃及最富有的地区，曾拥有最多的人口。最大、最复杂、社会分层最早出现的聚落都分布在南方。最有力的证据是 Brunton 在赫拉康波里斯的发掘，他发现了至少 6 个烧制陶器的窑，它们证明了“前王朝时期大的中心如赫拉康波里斯社会内部的复杂性和制造业、建筑业的成熟”。

史前史的研究者倾向于把考古发现与族群形成联系起来，考古资料中器物的特征被看作是族群身份的体现。巴达里或者涅伽达文化陶器、石器及其他器物风格上的不同，也表明这些文化的创造者是不同的族群。对这些学者来说，风格的混杂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一种风格取代另一种风格则意味着征服。正如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所说的：

几乎考古记录里所有的文化变革，都被归因于观念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传播，或是移民所导致的某一群体及其文化被另一群体取代……皮特里的著作是后一种模式的例证，在探讨埃及史前时期的发展时，皮特里用大规模移民以及少数移民与当地人在文化和人种方面的混合所带来的变化来解释所有文化变革。他认为任何文化上的重大变化都必然伴随着人种的改变。

基于这种认识，涅伽达文化的扩展过程等同于征服的过程——先在南部完成统一，随后征服三角洲地区。在从酋邦到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南部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如涅伽达、赫拉康波里斯、阿拜多斯等，而北方大部分地区还滞后在聚落阶段。争霸和统一最先在南方进行，最后阶段是对北方三角洲的收编。

上述推理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国家起源的过程中，发展条件良好的三角洲地区为何滞后？为何最早的政治中心出现在南方？

墓葬文化与国家起源

考古资料不能直接反映人类的历史，留存下来的古代遗存多数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产物，没有对古代思想的深入考察和分析，考古学家的工作只能是盲人摸象。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畏惧死亡。相信来世的存在，或多或少能摆脱这种恐惧。因此，当时的人们在埋葬死者时精心准备，把许多生活用品摆放在死者身旁，随后还举行葬礼。在埃及的前王朝时期，人们很可能就已经有了人在死后仍会存在的观念。在此后的三千年中，这种观念一直在埃及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埃及人把尼罗河西岸当作埋葬

之地，那里是每天太阳落下的地方，死者的灵魂也应在那里安息。

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墓地不仅是永久存放尸体和各种贡品的场所，也是死者的纪念地，在那儿亡灵能定期得到献祭，倾听生者的祈祷声。各地墓地邻近居住区，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一个人或其宗族的地位如何，在公众眼中一望便知，不仅是通过其陵墓的规格，且通过安葬后祭拜的次数、规模，以及有多少哀悼者，每次举办的仪式的规格。这样墓地不仅仅是人们献祭、为亡灵祈祷的场所，也是定期举行宗教仪式之处。生前显贵的死者的墓葬和祭祀仪式甚至可与当地地方神的崇拜仪式结合起来，而且大人物陵墓的周围分布着其亲族、仆从等的较简单的坟墓，其等级秩序一如生前。

古埃及人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费在他们的“永久居所”——陵墓的修建上。为实现无限延长生命的愿望，他们选择了本土富产而且最为经久耐用的建材——石头，像把死者尸体加工成木乃伊一样，希望肉体的延续与居所的永久坚固结合起来，共筑一个永恒的来世。

对古代埃及人来说，死后的墓葬规格也是生前社会地位的反映，而王陵则是王权强大与否的某种标志。

只有充分认识到来世信仰对于古埃及人的重要性，才能理解上下埃及发展的不同步，以及二者的地理差异带来的深层影响。

在狭长的河谷地带，靠近河谷的低地沙漠和绝壁保存了大量的墓地和随葬品，纪念性的大型墓区多数分布在那里。相反，在北部的三角洲地区，则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墓区，大部分古代遗址在现代建筑下面，或者因为尼罗河支流改道而无法确定位置。埃及学的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因此更加侧重沙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文献多聚焦南方，而不是社会、文化和经济各方面都可能更为重要的北方。这个倾向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中都体现出来。

但这种倾向也不仅是现代人对古代环境的错误解读。在古代，沙漠和墓区也深受人们重视。自公元前 5000 年以来，用于墓葬的支出在南部埃及一直占据首位，特别是低地沙漠和绝壁地带的墓区，狭长河谷两侧的沙漠有着建造纪念性建筑的巨大潜力，这是开阔的三角洲平原所没有的。对大型建筑而言，低地沙漠有充分的空间，大片的基岩，稳定的地基，大量的石料，金字塔一类的巨型建筑只能在这里建成，在每年泛滥的河谷地带则很难想象。新王国时期，大型神庙建筑集中在南部埃及的底比斯等地，但纪念性建筑再也没有达到金字塔建筑群的规模。

纪念性墓葬建筑展示的传统传承于河谷地带的南部埃及，这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模式。即使现存文献中关于墓葬的内容占据首要地位，而判断墓葬支出的情况可能还是取决于保存的环境，这种突出特点与古代物质环境相关联。这并非是说古埃及人沉迷于死后世界，将现世看作短暂的过渡期，或者是说他们直接把尼罗河两侧的沙漠当作死后世界。贵族偏爱以墓葬建筑作为展示社会地位的方式，特别是孟菲斯和南部埃及的地方贵族，是因为墓

葬区更适合作为城市和神庙区。如果临近的沙漠地区不是那么容易进入，或者河谷与三角洲没有这么大的反差，墓葬建筑也许不会有那么显要的地位。

统一之前，南部埃及最重要的三个遗址是涅伽达、赫拉康波里斯、阿拜多斯。它们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墓葬文化在国家起源阶段的关键作用。当代涅伽达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村落，它的古代遗址在现代村落北边7公里处，在图赫（Tukh）和巴拉斯（el-Ballas）之间。从其规模来看，涅伽达是史前后期非常重要的城镇，它在古埃及语中叫 Nubt，来自 nub，即“黄金”一词，很有可能是因为从这里通过哈马玛特（Hammamat）干谷就可到达东部沙漠的黄金矿区，才有这个名字，这也是该城在当时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原因。从经济角度看，控制该地区东部沙漠的黄金资源和各种矿产是涅伽达崛起的关键因素。

在涅伽达 II 期，涅伽达文化开始迅速向北部三角洲和南部扩散，但并没有发现军事征服的痕迹，与同质文化形成同步发生的是墓葬建筑和仪式的复杂化。比如在涅伽达 T5 号墓发现被砍头的遗骸，在阿迪玛发现割喉又砍头的遗骸，证明人殉现象的存在。

涅伽达 II 期，南部墓葬图像中船的形象成为最突出的特点。此时各遗址出土大量象牙、乌木、黄金、动物皮革、香料等，尼罗河上的船队成为当时贸易网络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也发现了埃及与当地贸易的大量证据，涅伽达 II 期与近东地区的青铜早期（EBA）对应，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发现了大量埃及工匠用埃及的技术但是当地的材料制作的陶器。以色列考古学家认为埃及人不仅在当地有商站，而且已经控制了当时近东地区的远程贸易网络。

涅伽达 II 期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工艺品的标准化、精致化。作为纪念物的调色板形式逐渐趋同，以长方形和长菱形为主，调色板上开始出现浮雕。权标头也由圆盘形状演变为梨形，这些都是后世艺术典范的原型。

涅伽达 III 期时，涅伽达衰落下去，该遗址的墓葬随葬品较 II 期时规模缩减，在原来墓地的南部六公里处，全新风格的“王宫”样式的新墓地出现。与此同时，南边的赫拉康波里斯和阿拜多斯后来居上，标志早期王权出现的三个代表性艺术品都发现于赫拉康波里斯：纳尔迈调色板、纳尔迈权标头、蝎王权标头。赫拉康波里斯的 100 号墓是埃及尚存的第一个有墓室壁画的墓，画面出现了与纳尔迈调色板上相似的打击场景——形象高大的国王用权杖打击外族人。纳尔迈权标头所表现的并不是战争场景，而是与王权相关的领土仪式，其中南北疆界、王座平台、国王奔跑、荷鲁斯的追随者等元素与第3王朝乔塞尔梯形金字塔的塞德节浮雕极其相似。蝎王权标头表现的是头戴上埃及白色王冠的蝎子王站在水渠旁，手持锄头，一个仆人正在递上一个篮子，整个画面展现的是国王在主持开渠仪式。

在阿拜多斯，德国考古队在 U-j 墓发现了 0 王朝的王陵，其中蝎子王的墓中出土了迄今最早的古埃及文字，刻写在 180 多个象牙和牛骨制作的标签上，标明随葬品的产地、数量及其出产年份。该墓还出土了数百个葡萄酒罐，里面的葡萄酒是从巴勒斯坦地区进口的。

阿拜多斯的主神是墓地之神肯塔门提乌（Khentamentiu），他的名字直译为“西方众

人之首”，即“死者之王”，到第5、6王朝时，肯塔门提乌开始与起源于下埃及的繁殖之神奥赛里斯结合，渐渐地奥赛里斯成为人们普遍崇拜的冥世之神。到中王国时期，阿拜多斯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中心，这里每年举行模仿奥赛里斯的死亡和复活的仪式，叫作“奥赛里斯的神秘”，这是当时最盛大的宗教节日之一，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信徒前来参加。许多人希望在死后也能参与这个盛典，能跟随奥赛里斯完成复活，所以他们在阿拜多斯修建了泥砖的衣冠冢，并且在衣冠冢与奥赛里斯神庙之间的地带立起了石碑。这个衣冠冢墓区是当地最大的墓地。

阿拜多斯的重要性一直延续到王朝时期，即使都城在孟菲斯，第1王朝的所有国王和第2王朝的两个国王依旧选择阿拜多斯为王陵所在地。这些墓的地上建筑都不存在了，地下是泥砖砌的墓坑。这里发现了刻有国王名字的石碑，圆柱印章，象牙和乌木的标签，石器和家具的碎片等。国王杰尔（Djer）的墓被后来的埃及人当作奥赛里斯的墓，周围有许多18王朝及其后各时期的献呈陶罐。

作为古埃及王权理论的核心神话——奥赛里斯的传说，也反映了古埃及王权在诞生之初即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奥赛里斯是古代一个贤明的君主，被嫉妒他的弟弟塞特（Seth）谋杀，尸体被分为碎块，抛入河中。他的妻子伊西斯（Isis）找回尸体碎片，并感动神明使之复活，成为阴间之主。他的儿子荷鲁斯（Horus）又为他复仇，从塞特手中夺回王位，成为新的君主。对古埃及人来说，每个活着的国王都是荷鲁斯，他死去的前任是奥赛里斯，他死后也成为奥赛里斯，而新的国王又是新的荷鲁斯。王位继承就处在这样的循环中。国王去世是秩序的中断和破坏，而新君即位则是秩序的恢复。在神王的庇佑之下，生命可以穿越死亡的门槛，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时代，古埃及人将王权的合法性与相信来世的宗教信仰糅合在一起。这也是古埃及几千年文明最强大的稳定剂。

上下埃及与象征地理学

古埃及的国王自称“上下埃及之王”，这个称号也反映了河谷与三角洲在地理上的差别。古埃及国王的五种头衔中，有三种是反映上下埃及对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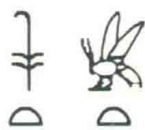


图1 树蜂衔

树蜂衔（代表上埃及的树，代表下埃及的蜜蜂）（图1）

双夫人衔（代表上埃及的秃鹫女神，代表下埃及的眼镜蛇女神）（图2）



图2 双夫人衔

上下埃及之王（白冠象征上埃及，红冠象征下埃及）

“二元对称”是古埃及人思维方式和表达体系的核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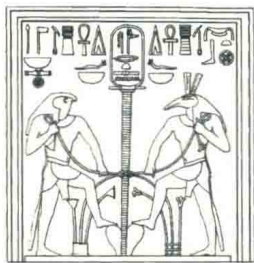


图3 赛索斯特里斯王座
侧面浮雕

体现古埃及王权理念核心的奥赛里斯神话，也是古埃及人“二元对称”思维模式的典型表达。在古埃及的传统中，荷鲁斯与塞特也分别代表上下埃及，但其象征意义却不能简单等同于地域上的“二元”，其内涵远远超越了地理象征。而这种内涵有着很多佐证。如 11 王朝国王赛索斯特里斯的王座侧面浮雕（图 3），就是荷鲁斯与塞特神话的很好注脚。在画面上，荷鲁斯与塞特面对面站立，荷鲁斯手挽象征下埃及（北方）的纸草，塞特手挽象征上埃及（南方）的芦苇，两种植物绕在表示“统一”的符号上，两位神在合力拉紧。

如何理解荷鲁斯与塞特神话和早期国家起源之间的关系？神话暗示着真实的历史进程吗？早期的学者倾向于“对号入座”，认为第 1 王朝之前，埃及有南北两个王国，后来北方征服了南方，完成了统一，因此国王被称为上下埃及之王，而王权的象征也有了如此突出的南边二元对称的特征。

但是，发现于南部埃及赫拉康波里斯的纳尔迈调色板（图 4），却讲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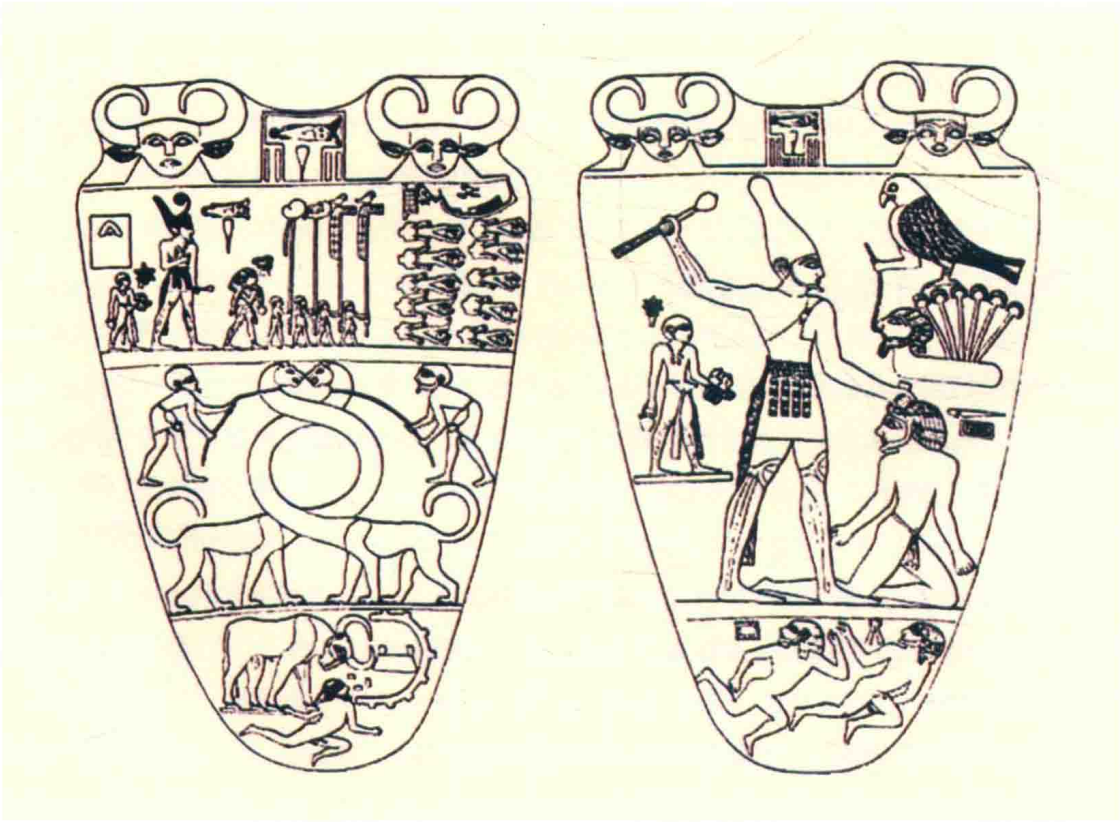


图4 纳尔迈调色板 埃及国家博物馆藏

调色板两面的正上方，两个母牛头之间的“王名框”里，都写着纳尔迈的名字。在调色板的正面，纳尔迈头戴象征下埃及的红冠，和六个人走在一排，其中两个随行者只有他一半高。国王右边的那个一手拿着凉鞋，一手拿着小器皿，脖子上挂着胸饰；他后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框，里面有象形文字；他前方还有玫瑰图饰和一个读作 hm 的符号，它有几种含义，其中之一是“仆人”。国王左边的官员形象稍微高大些，带着假发，穿着豹皮衣服，脖子上好像挂着书写工具。他头顶上的象形文字为 tt，是“宰相”一词较早的写法。走在国王和这两个随员前面的，是比例更小的四个举旗人，四个旗杆顶上分别是两个鹰，一个豺狼（可能是 Wepwawet 神），以及一个奇怪的球状物，有的学者认为是 sdsd 或者王室胎盘。这就是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的组合。国王一行的前方，是 10 个斩首的尸体，被砍掉的头放在死者的两腿之间。尸体的上方有 3 个图像：一个门，一个首尾都很高的船，一个举着鱼叉的鹰。

在调色板的反面，纳尔迈的形象更加高大，他戴着象征上埃及的白冠，左手抓住落腮胡子的俘虏的头发，右手高高举起权杖，作打击状。俘虏头部的右侧有两个表意符号，很像早期象形文字中的“鱼叉”（w）和“湖”（s），这与调色板正面抓着鱼叉的荷鲁斯的图画正好对应。在国王前面，俘虏上面，鹰神荷鲁斯抓着系在俘虏鼻子上的绳子，俘虏的身躯是象形文字的“土地”这一符号，而土地上面长出 6 根纸草，有人认为这象征着“6000 个来自纸草之地的俘虏”。

综合调色板正反两面上被纳尔迈征服的人的形象特点，纸草地、鱼叉、湖等，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来自南方赫拉康波里斯的纳尔迈征服了北方，他先后戴着红白两种王冠，庆贺统一战争的胜利。

如果我们对这些纪念物进行看图说话式的直接解读，并尝试把读出的信息与历史进程挂钩，我们就陷于深深的混乱和矛盾之中。奥赛里斯神话中，代表北方的荷鲁斯征服了代表南方的塞特，而纳尔迈调色板则讲述了南方征服北方的故事。

早期国家的起源伴随着高级文化的出现，其主体打造者是服务于王室的贵族阶层，主要过程是在整合地方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的艺术法则和经典主体，以文字、艺术品、建筑等多种形式表达。纳尔迈调色板是第一批高级文化的作品之一。这类作品是意识形态的浓缩和符号化表达，它们是功能性、仪式性的，基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化的世界，而不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在古埃及的观念中，历史就像许多人共同参与的宗教戏剧，历史事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动的强化，人物有固定的角色，事件也像宗教仪式那样有着固定的作用。

现代人总是希望将“真实”事件和仪式区分开来，这会我们对纳尔迈调色板一类的艺术品的分析复杂化，附加上太多现代人的理解。高级文化中最真实的信息不是历史的而是观念的，是古埃及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及在此主导下的仪式和习俗。

神话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神话

关于神话和历史的区别，埃及学家雷德福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它们的意义（即神话的意义）与其曾在过去发生没有任何关系，而与它们现在的重要性有关……荷鲁斯对父亲的支持、舒神被举起以及奥赛里斯被谋杀——这些都是原始事件，它们是永恒的，一直在发生；而那些重现这些事件的国王或祭司都不能被认为是在扮演一个历史人物或是在纪念‘历史’。”

神话中的文化记忆和早期纪念物中传递的信息，都无法与考古资料直接进行对应。考古发现证明，早期荷鲁斯崇拜的重要中心是赫拉康波里斯，而塞特的崇拜中心是涅伽达，这两个遗址都在埃及的南部，涅伽达在赫拉康波里斯北面。

前王朝遗址中，最早出现在“王名框”上方，表现两个王国统一的成对神祇并非荷鲁斯与塞特，而是一对荷鲁斯，逐渐才演变为荷鲁斯与塞特面对面（图5）。

红白王冠的象征也是一样。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红冠（象征北方），是现身在南部埃及的涅伽达，当然，相对于赫拉康波里斯，它还是北。也就是说，红白王冠最早代表的是南方的北与南。

在埃及完成统一后，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中，埃及的知识精英把红白王冠象征的“北与南”放大到了更宽泛的地理范围之中，与三角洲和河谷的上下埃及二元对应了起来。

以荷鲁斯代表北方，塞特代表南方，则是统一完成之后形成的最意味深长的国家神话，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是直接对应而是隐喻性对应：统一后的第一个都城是北方的孟菲斯，对意识形态的创造者来说，南方象征着之前那个分裂无序的时代，而孟菲斯标志着大一统的新时代的到来。

将王权神话放在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孟菲斯神论》对奥赛里斯神话的改造，就有了充分的动机。在该版本中，天神盖伯两度裁决，先令荷鲁斯与塞特分别统治上下埃及，最终决定让荷鲁斯独自统治，而且塞特表示了服从。其中一些细节值得注意：当盖伯判决荷鲁斯胜出时，是这样表述的：“将他的全部遗产都给他，因为他是他长子的儿子。”这里的全部遗产，指的就是全部埃及，也就是说，在荷鲁斯与塞特纷争之前，这份遗产是完整的。加入南北分治的第一裁决这一情节，以及对遗产曾经完整的暗示，都是《孟菲斯神论》创作时代——第25王朝的需求。在古埃及的文化传统中，孟菲斯是正统的象征，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需要证明自身合法性的统治者或者朝代，都会以孟菲斯大做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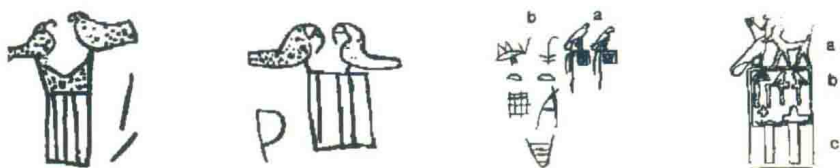


图5 表现上下埃及统一的成对神祇的变化